

老年大学对于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作用探析

章 灿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31日

摘 要

在积极老龄化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过程中, 老年大学如何将宏观政策转化为老年人的个体福祉, 是亟待回应的议题。本文基于“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支柱的理论框架, 系统考察老年大学在推进积极老龄化中的复合作用机制。老年大学的作用集中体现为三条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路径: 在健康维度, 通过系统课程与社交互动构建身心整合的健康资本; 在参与维度, 通过数字赋能与组织化平台实现从学习到社会贡献的能力跃迁; 在意义维度, 通过角色重建与再社会化促成老年人生命意义的建构与代际辐射。三条路径协同发力, 使老年大学超越了单一教育机构的定位, 成为联通国家战略与个体行动的综合性枢纽。然而, 受制于管理体制碎片化、战略认知偏差、资源配置失衡与教育内涵偏狭等现实挑战, 其潜能的充分发挥仍有赖于法治保障、多元投入与内涵建设的系统性推进。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 老年大学, 健康资本, 参与赋权, 生命意义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enior Universities in Promoting Active Aging

Can Zh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17,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July 31, 2026

Abstract

As active aging transitions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the question of how senior universities can translate macro-level policies into individual well-being for older adults is an issue that demands urgent att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hree pillars—“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enior universities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active aging. The role of senior universities is epitomized by

three progressive, spiraling pathways: in the health dimension, building integrate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pital through systematic curricula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participation dimension, achieving a capability leap from learning to social contribution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organized platforms; and in the meaning dimension,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mean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among older adults through role reconstruction and resocialization.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of these three pathways enables senior universities to transcend the role of a mer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ransforming them into comprehensive hubs that bridg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individual actions. However, constrained by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fragmented management systems, strategic misperceptions, im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 narrow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ir potential still depends on the systematic advancement of legal safeguards, diversified investment, and the enrichment of educational content.

Keywords

Active Aging, Senior Universities, Health Capital, Participatory Empowerment, Meaning of Lif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不可逆转的全球性趋势，我国正经历着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单纯强调照料与供养的“消极养老”模式已难以为继。以“健康、参与、保障”为三大支柱的“积极老龄化”理念，因其强调老年人的潜能、权利与社会贡献，已成为国际社会及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导政策框架[1]。世界卫生组织将其界定为“为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的过程”[2]。将这一宏大战略转化为具体的个体福祉，需要制度化的载体与抓手。老年教育，尤其是以老年大学为代表的制度化教育形式，正是连接国家战略与老年人个体生活的关键桥梁。自 1983 年我国第一所老年大学成立以来，其发展经历了从面向离退休干部的“福利型”教育向保障全体老年人受教育权利的“权利型”教育的转变[3]。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大学不仅是“老有所学”的实现场所，更是整合“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综合平台，是三大支柱协同发力、落地生根的关键实践阵地。

围绕积极老龄化与老年教育，国内外研究已形成丰富积累。国际学界普遍认同老年学习与认知活力、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4]，国内学界近十年以“老年大学”“社区教育”“终身教育”为高频主题持续推进，但对三大支柱的系统协同研究仍较薄弱[5]。在价值定位上，学界存在明显张力：部分学者强调老年教育应推动老年人发挥自身价值、获得社会认可；另一些学者则从赋权增能理论出发，主张坚持“学习为上”，警惕将老年教育简化为人力资源开发工具。在实证层面，马皓苓基于 CGSS 数据证实参与学习能使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概率分别提升 6.79% 和 4.06% [6]；杨丽娜等基于四所老年大学的田野调查，揭示了老年教育供需在数量、内容与形式上的三重结构性矛盾[7]；陈兰双等系统梳理了老年教育促进心理健康的实证证据，从能力视角、补偿视角和 PERMA 模型阐释了其作用机制[8]。既有研究侧重宏观制度设计或单一支柱效应，以老年大学为中观组织、系统考察三大支柱协同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仍不够充分。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将“健康、参与、保障”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尝试揭示老年大学作为国家战略与个体行动之间关键节点的复合作用机理。

2. 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与老年教育的内在关联

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以“健康、参与、保障”为三大支柱，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共同指向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尊严的终极目标。老年大学的作用，恰能够在这三个维度上找到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发挥空间。

2.1. 健康支柱

健康是积极老龄化的基础，涵盖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老年大学通过提供结构化的学习与活动，直接介入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其开设的养生保健、营养膳食、常见病防治等课程，直接传授科学健康知识，引导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起到疾病预防与康复辅助作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参与学习能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概率提升 6.79%，心理健康的概率提升 4.06% [6]。这一宏观效应在老年大学场域中得到具体印证：规律性的上学节奏促使老年人保持社会联结与户外活动，有益于身体机能维持。有研究系统综述了国内外 30 余项实证研究后发现，老年教育从情绪情感、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三个层面显著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其作用机制包括增强控制感与自我效能感的能力路径、缓解角色丧失压力的补偿路径以及强化积极情绪与社会联系的 PERMA 路径[8]。更重要的是，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本身就是积极的认知训练，有助于延缓大脑衰退。一项以老年大学学员及其未入学的同胞兄弟姐妹为对照的研究显示，学习一年后，未入学组有 5.77% 达到认知损害临界值，而学员组仅 0.95%，且智力操作分下降幅度显著更小[9]。此外，课堂内外形成的朋辈支持网络，能有效缓解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调查发现，老年大学学员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非学员组，控制感和生活满意度也呈现优势[10]。这使老年大学成为“治疗老年人心理疾患的最佳‘医院’” [11]。因此，老年大学是从身、心、脑多个层面夯实健康基础的有效干预手段。

2.2. 参与支柱

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与精髓，强调老年人根据自身意愿与能力，持续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及公益事务[12]。老年大学为这种参与提供了最制度化、最可持续的平台。首先，学习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参与，是老年人主动融入社会、对抗边缘化的积极行动。其次，老年大学能够将个体的学习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全国调查显示，经常性开展社会志愿活动的老年大学超过七成，超六成经常举办才艺表演和专题讲座[13]。书画班学员为社区写春联，文艺团队举办公益演出，摄影班记录城乡变迁，法律班学员提供咨询，这种“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模式，使老年人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价值的创造者和传递者，实现了“老有所为”。基于四所老年大学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现，老年大学通过培育银发志愿服务团队、搭建社区互动平台等方式，有效拓展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但也揭示了当前参与类课程供给不足、实践机会分布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7]。同时，老年大学通过课程赋能帮助老年人克服参与障碍，已有超过 50% 的学校开设了信息技术类课程，超过 40% 开设了医学、文学类课程[13]，直接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提升现代社会参与能力。最后，老年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组织，学员通过参与班级管理、活动策划等，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提升了社会参与效能感。

2.3. 保障支柱

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支撑，旨在通过政策、法律与社会支持体系，确保老年人的权利、安全与尊严。老年人“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4]。老年大学的发展规模、覆盖范围、资源投入和质量水平，直接反映了这项权利保障的落实情况。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全国老年大学约 10.5 万所，线上线下学员约 3000 万人[15]。这些成就表明，一个资源不断充实、覆盖面持

续扩大的老年大学网络正在形成。然而,我国老年教育对“积极老龄化”内涵理解不透彻、顶层设计缺少系统性,是制约保障水平提升的深层障碍[16]。从保障水平的均等性来看,我国每万名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拥有的老年大学仅约4.3所[17],城乡与区域间的供给不均衡现象依然突出,这也暴露出权利保障在基层落实中的短板。相关田野调查印证了这一判断:老年教育存在需求数量增长与供给有限、需求内容多样与供给单一、需求形式多元与供给单调三种矛盾,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以制度完善扩大资源供给、以师资和内涵建设丰富教育内容[7]。因此,发展老年大学不仅是满足需求,更是履行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庄严承诺,需不断弥合差距,实现普惠。

需要指出的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之间并非天然耦合,其内在逻辑亦存在一定张力。以“参与”与“健康”的关系为例,过度推崇普及“老有所为”可能对部分健康状况不佳或参与意愿不强的老年人构成新的社会期望压力,甚至诱发“积极年龄歧视”,使无法或不愿符合“积极老龄”范式的老年人被视为消极或欠理想的老化典型。有学者指出,积极老龄化思想存在“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以及“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等局限[18]。尤其当“参与”被简单化约为外在可见的社会贡献时,那些因疾病、失能或偏好静养而无力参与高强度集体活动的老年人,其晚年生活的价值和尊严可能被无形遮蔽。因此,在实践中推进三大支柱的协同发力,需要保持对老年群体内部差异性的充分敏感,避免将“积极”矮化为单一标准,而应在保障底线的前提下,尊重多元化的参与方式和老龄形态。

3. 作用探析

基于前述理论框架,老年大学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以下三条相互交织、层层递进的核心路径。

3.1. 健康资本的积累

老年大学的首要作用在于通过系统化学习与隐性社会互动,积累老年人的整体健康资本。其显性路径体现为保健类、体育类课程的直接健康干预功能;隐性路径则更为深刻:规律的学习节奏促使老年人保持作息节律与社会联结,而课堂内外形成的朋辈支持网络,能有效缓冲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老年教育通过建构新的社会角色和意义系统,帮助老年人完成从“工作角色”向“学习角色”的身份过渡,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积极的心理资本建设[19]。上述的实证研究已充分证明,这种集知识传递、认知刺激与情感支持于一体的复合机制,使健康促进超越了单纯的医疗干预,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与人文温度。

3.2. 参与能力的赋权

如果说健康积累是积极老龄化的基础,那么参与能力的提升则是其核心引擎。老年大学的作用不在于替代老年人完成社会参与,而在于通过教育赋权为其参与创造条件、扫清障碍。信息技术、智能设备应用等课程直接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缓解因技术脱节导致的社会排斥。当前我国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仍落后于数字社会转型且内部差距较大,亟需以多元化、多层次、更具精准性的数字治理理念培养老年人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20],这恰恰凸显了老年大学开展分众化数字教育的战略价值。更重要的是,老年大学通过组织化平台将个体学习成果转化为社会可见的贡献,形成了“学用结合”的稳定模式。基于全国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银发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提升数字素养对增强老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21]。这种“学习-服务-再学习”的循环机制,使老年人完成了从“知识消费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角色跃迁,实现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反哺”功能,而不仅仅是闲暇消遣[22]。组织化参与降低了个人行动的门槛,使老年人的贡献更易于被社会看见和认可,从而形成“参与-认可-再参与”的正向循环。

3.3. 生命意义的建构

在健康与参与之上,老年大学更深层的作用在于回应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意义追寻。退休、丧偶等生命事件使老年人面临“角色退出”后的认同困境,再社会化成为应对这一困境的核心过程。不同于青年期以职业能力习得为核心的初级社会化,老年期再社会化重在既有生命经验基础上的角色重构与意义调适,其价值重心从“向上流动”转向“意义维护”,一般经历角色转换与心理调适、技能更新与社会联结、新角色确立与社会贡献三个阶段。老年大学以规律课程、信息技术课程以及社团志愿服务[13],分别为这三个阶段提供结构化支撑,构成从身份失落走向意义重建的桥梁。研究发现,参与老年大学学习的老年人对老化持更积极的态度,抑郁和孤独水平显著更低,家庭关系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更高[10]。这一过程亦为“自我实现”的重要通路:在书画、音乐等领域深耕使学员体验到创造的心流与成长的自洽[23],构建起既有个人意义又有社会回声的晚年生活方式。从教育社会学视角看,老年期的“社会化”是毕生发展的重要环节,老年教育应超越功能主义范式,从关注个体如何适宜于社会转向关注社会如何通过教育赋予老年人充分发展的机会,这为理解老年大学何以促进生命意义建构提供了深层理论支撑。在家庭层面,学员将健康观念与新知识带回家庭,促成自下而上的代际文化传递;在社区层面,学员常成为文化活动骨干与基层治理的积极力量。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整体水平虽低于中青年,但在环境保护、老年关怀类志愿服务中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凸显了老年群体在特定领域的参与潜力[24]。这种个体唤醒与社会辐射的双向效应,使老年大学成为积极老龄化理念从政策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关键枢纽。

综上,三条路径相互交织、层层递进:健康资本为参与能力奠定身心基础,参与能力的拓展反过来巩固健康资本,两者共同支撑生命意义的建构;而意义感的获得,又为持续参与和健康维护注入深层动力。三者环环相扣、螺旋上升,使老年大学成为积极老龄化从理念走向实践的综合性枢纽。

4. 现实挑战

尽管老年大学作用显著,但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发展仍面临系统性制约。

首先是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不健全。我国老年教育至今缺乏专门的法律保障,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老年教育法》,现行政策多以部门规章或指导性意见的形式存在,强制力与可操作性不足。在管理体制上,老年大学分属教育、民政、老龄、文化、组织等多个部门管理,形成了碎片化的多头管理格局[25]。随着办学规模扩大,主管部门权责交叉却又责任虚化,缺乏统一的机构设置标准、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和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同系统举办的老年大学在资源配置、课程标准和师资准入等方面差异悬殊。因此,老年教育管理体制亟需从多头管理走向系统整合[25]。

其次是战略认知与价值定位偏差。在上述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老年大学的功能在政策话语与社会观念层面长期被窄化。仍有相当一部分决策者与公众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休闲娱乐”场所或面向离退休干部的“福利性”安排,未能从推进积极老龄化的战略高度认识其基础性作用[26]。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在公共资源分配中,老年大学往往被置于教育体系与老龄工作体系的交叉边缘地带,难以获得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同等的制度性保障;二是在社会文化层面,老年学习被贴上“闲暇消遣”的标签,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与成长潜能被系统性低估。这种“娱乐化”定位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对老年群体价值的深层偏见,使老年教育长期受困于定位模糊、资源旁落的境地[26]。

再次是资源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这一制约是多维度的。办学经费上,85.36%的县级及以上老年大学为政府办学,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部分基层存在无机构、无人员、无场地、无经费的困境[13]。师资上,兼职教师比例高达91.27%,专业化、稳定性严重不足[13]。设施覆盖上,城乡差距尤为突出:城市中心校区供不应求,而农村地区资源极度匮乏,部分城市社区老年学校覆盖率仅为13%。数字化与适老化设施同样滞后,计算机教室配置率仅为56.77%,专业录播室28.69%,仅46.2%的老年大学设置了无

障碍坡道[13]。

最后是教育内涵与覆盖面有待深化拓展。课程体系仍以颐养康乐型为主导，书法、声乐、舞蹈等传统课程占据主流，而在数字素养、金融安全、退休规划、志愿服务管理等“发展型”“赋能型”课程开发上明显滞后，回应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需求的能力不足。同时，服务对象仍集中于低龄、健康、城市离退休人员，高龄、农村、低学历、失能半失能等最脆弱老年群体被严重边缘化。随着高龄化趋势加剧和老年群体内部异质性增强，如何从服务“优势老年群体”走向“普惠全体老年人”，成为老年大学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

5. 对策建议

充分发挥老年大学在推进积极老龄化中的正向作用，需采取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措施。

第一，提升战略定位，加强顶层设计。应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明确老年大学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加快推动《老年教育法》立法进程，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社会、个人的权责利。理顺管理体制，建议确立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管，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管理机制，并将老年教育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第二，创新供给模式，拓宽资源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补充”的多元办学格局。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并建立与老龄化程度挂钩的稳定增长机制。通过税收减免、购买服务、荣誉激励等政策，大力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慈善力量捐资办学、合作办学。强力推动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利用资源富余优势举办或支持老年大学，探索“高校办老年大学”的深度合作模式[27]。

第三，深化内涵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课程体系，构建“康乐型、发展型、赋能型”相结合的立体课程体系。在保留传统优势课程的同时，大力开发数字素养、金融安全、退休规划、轻职业技能、志愿服务管理、代际沟通等符合时代需求与老年人潜能的课程。改革教学方式，推广混合式教学，开发优质适老的线上资源，同时配强线下辅导以跨越数字鸿沟。倡导体验式、游学式、研讨式教学，增强学习吸引力。专业化师资队伍，建立老年教育教师资格认证与培训体系，在高校相关专业开设老年教育方向，培养专业人才。完善兼职教师聘任与激励机制，建设稳定的高素质师资库。

第四，强化研究与宣传，培育积极老龄文化。设立国家级老年教育研究专项，鼓励跨学科研究，为政策制定与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利用全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积极老龄化理念和老年大学的成功故事与学员风采，改变社会年龄歧视，营造终身学习、老有所为的社会风尚。同时，应探索建立分层分类的积极老龄化评价体系，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参与意愿差异设定多元标准，从制度层面规避“积极年龄歧视”，尊重每一位老年人的独特价值与老龄形态。

6. 结语

本文以“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支柱为框架，系统考察了老年大学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老年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作为国家战略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键枢纽，通过“健康资本积累 - 参与能力赋权 - 生命意义建构”三条路径协同发力：以课程与社交夯实身心健康基础，以数字赋能与组织化平台打通学习到贡献的通道，以角色重建与再社会化引导老年人完成意义跃迁。三条路径环环相扣、螺旋上升，使老年大学成为积极老龄化从理念走向实践的综合性枢纽。然而，管理体制碎片化、战略认知偏差、资源供给失衡与教育内涵偏狭等现实挑战仍制约其功能释放。充分发挥老年大学的潜能，需以法治手段理顺体制、以多元投入弥合城乡鸿沟、以立体课程与专业师资推进内涵建设，并将服务对象从“优势老年群体”拓展至全体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真谛不在设立单一标准，而在保障每位老年人按自身意愿持续成长的多元可能——这正是老年大学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2] 宋全成, 崔瑞宁. 人口高速老龄化的理论应对——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4): 36-41.
- [3] 吴遵民, 彭娴, 杨慧康. 论国家老年大学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5, 37(5): 3-11.
- [4] Gonçalves Gaia, W.N., Vieira da Silva, W., Santos Costa Vieira da Silva, L., Alves Barbosa, M., Kuhn, N. and Veiga, C.P.D. (2024) Enhancing Quality of Life for Older Adults through University Education: A Scoping Review.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50, 973-992. <https://doi.org/10.1080/03601277.2024.2368319>
- [5] 杨晓帆, 张宏伟, 王新友.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教育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 2014-2023 年 CNKI 数据库的文献分析[J]. 继续教育研究, 2024(9): 55-61.
- [6] 马皓苓. 参与学习活动何以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基于 CGSS 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 当代职业教育, 2024(2): 94-104.
- [7] 杨丽娜, 陈俊峰, 李祥.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供需现状及价值反思——基于 G 省四所老年大学的质性研究[J]. 当代职业教育, 2024(2): 105-112.
- [8] 陈兰双, 宋莉莉, 张镇. 老年教育与心理健康: 实证、理论和机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31(5): 1257-1262.
- [9] 徐文炜, 吴越, 林媛媛, 等. 参加老年大学学习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0, 19(12): 1120-1122.
- [10] 刘彩梅, 高林, 夏洁, 等. 参加老年开放大学对老年人价值实现的作用[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3-17.
- [11] 龚一鹏. 试论老年大学的基本功能[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23(5): 85-87.
- [12] 刘颂. 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社会参与的难点及对策[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22(4): 5-9.
- [13]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状况调查报告[R]. <http://www.crca.cn/index.php/14-activity/1142-2024-12-25-03-54-42.html>, 2024-12-08.
- [14] 许占鲁. 老年大学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J]. 成人教育, 2015, 35(4): 34-36.
- [15] 康琼艳, 吴秉泽, 李思隐. 老有所乐 从热闹走向长久——养老问题面面观[N]. 经济日报, 2026-04-15(11).
- [16] 王俊德, 李本友. 学习型大国建设背景下我国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诉求、表征及对策[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30): 58-63.
- [17] 全国老年大学统计信息[EB/OL].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4/09-29/10294675.shtml>, 2024-09-29.
- [18] 陈友华, 孙永健. 积极老龄化: 理念、局限与拓展[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1): 2-18.
- [19] 王英, 谭琳. 赋权增能: 中国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反思[J]. 人口学刊, 2011(1): 32-41.
- [20] 宋月萍, 彭可余. 面向老龄化的数字社会治理: 现实、演变与未来进路[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44(5): 118-128.
- [21] 李庆显.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银发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基于 CSS2023 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 25(5): 32-43.
- [22] 叶忠海. 老年教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6): 11-16, 23.
- [23] 李宏洁, 张艳, 余自娟, 等.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进展[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2, 42(5): 1222-1226.
- [24] 黄种滨, 王晶. 2024 年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发展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蓝皮书: 202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 [25] 江颖. 从“九龙治水”到“百川归一”: 老年教育多元资源整合的理念阐释、逻辑框架和行动路径[J]. 成人教育, 2023, 43(11): 24-31.
- [26] 宋元林, 陈坤华, 韩家玲. 积极老年化背景下高校老年大学发展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15(5): 153-156.
- [27] 罗悦庭. 积极老龄化下老年教育发展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1.